

1911

中美关系史



(修订本)

第一卷

1949

陶文钊 著

1911

中美关系史

(修订本)

第一卷

1949

陶文钊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美关系史. 第1卷, 1911~1949/陶文钊著. —
修订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ISBN 978-7-208-13895-7

I. ①中… II. ①陶… III. ①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
-1949—1972 IV. ①D82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0697 号

责任编辑 秦 堃
封面装帧 胡 斌

中美关系史(修订本)

1911—1949

(第一卷)

陶文钊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江苏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80.5 插页 12 字数 1515,000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895-7/D·2889

(全三卷)定价 240.00 元

再 版 前 言

本书第一卷最早是1993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书名是《中美关系史(1911—1950)》。当时,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只打算写一本民国时期的中美关系史。此书出版后受到学界的好评和鼓励,恰巧我又调到美国研究所工作,于是着手继续往下写。由于一些客观原因,第二卷的写作时间拉得较长,幸好有美国研究所同事加盟,于1999年也完成了,并于同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是《中美关系史(1949—1972)》。写到这里,肯定不能打住,中美关系刚刚破冰。于是又往下写。第三卷的写作大大得益于两次出访。1999年冬,我受香港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罗曼丽(Priscilla Roberts)博士邀请去香港大学作访问学者,使我有五个月时间集中精力,专心写作。2002年夏,我受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项目主任海塞威(Robert Hathaway)博士邀请,去华盛顿作访问学者,使我有时间、有机会对一些美国前政府官员进行访谈,与美国同行切磋讨论。2004年第三卷完成了,上海人民出版社把三卷合在一起出版。因为这三卷都是编年史,遵循同一个体例,各卷虽相对独立,合在一起却也不觉得牵强。所以虽然不是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要写三卷,结果却是这样一套三卷本。

今年年初,上海人民出版社建议,距上一次出版已经十年了,学界对本书还有需求,他们准备再版。这当然是难得的机会。今年上半年我用几个月时间进行了修订。除了更正一些笔误和作些文字上的修改外,主要的修订有这样一些:

——第一卷序章中关于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溢款原来只是在一个注中提及,现在放到了正文里,而且增加了篇幅。庚款留学是两国文化交流中的一件大事,

对中国社会和两国关系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两国的文化关系正是本书比较欠缺的内容；

——第一卷第六章第三节加了一段中共二十多位高级将领 1945 年八九月间乘坐美军观察组的飞机从延安飞赴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情节。这是一次非常特殊的飞行，对当时国共争夺受降权的斗争意义重大。事情又相当偶然。但历史中不就是有许多偶然性吗？

——第一卷第八章第五节，也就是第一卷最后一节我决定删去了，一些内容并入了第二卷第一章第一节。写作第一卷时，我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美关系还没有“尘埃落定”，及至美中两国在朝鲜战场上干戈相向，中美两国对抗与隔绝的格局才确定了下来。但到开始写第二卷时，又觉得前面有些事情写得太简单了，所以第二卷第一章第一节对第一卷最后一节中叙述过的一些事情又作了若干补充，这样未免有些重复。现在把这个重复消除了；

——第二卷第一章末尾和全书末尾对朝鲜战争进行了评论。朝鲜战争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如何来看待这场战争，如何看待中美两国在战场上的较量，笔者从一个角度谈了一些想法；

——第二卷第八章第三节关于尼克松访华时在台湾问题上作出的承诺，根据现在解密的档案作了更清晰的表述；

——第三卷第四章第一节对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要点作了概述。这个政策经过过去三十多年的实践和检验，现在更加丰富和发展了，但当初提出的基本原则仍然适用；

——第三卷第八章对江泽民主席 1997 年访问美国、克林顿总统 1998 年访华作了强调。这次首脑互访是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重新正常化的标志，不是一般的高层访问，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第三卷增加了第十一章“新世纪以来的中美关系”，原来的结语改成了“走向新型大国关系”。本世纪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中美关系中有了许多新现象、新发展。我希望把一些带倾向性的问题记载下来。自然，对这十几年的叙述是粗线条的，其详尽程度和深度不能与书中其他各章相比。我现在有一个心愿：再续写一卷，从 2001 年到 2016 年，涵盖两个布什任期，两个奥巴马任期。时间跨度比不上前几卷那么大，但在一卷书中阐述十六年的情况也应该是可以的。希望这个小小的心愿能够得以实现。

在这次修订过程中，原来参与第二卷写作的同事又都认真地审读了各自的章节。友人任胜奇、张文宗帮助核实材料，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曹培雷副总编辑、秦堃同志做了细致的编辑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书中仍可能有错谬不当之

处,当由我负责。

当我完成本书的修订时,中美两国的关系并不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两国在东海、南海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公开化,在各种双边和多变的场合都在进行辩论,甚至争吵。于是产生了对于2013年提出的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悲观情绪,从媒体上可以明显感受得到。我认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底线是不对抗、不冲突,避免两败俱伤的情况。过去我们说,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现在这样说不够了,因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将深深地影响地区与全球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不但中美两国,甚至全世界都承受不起两国对抗和冲突的后果。当两国关系出现波折、发展不顺利的时候,我总会想起邓小平在两国关系最困难的1989年说过的一句话: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从那时以来二十多年过去了,这句话一再得到应验。现在这句话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适用。因此,我对两国关系仍然是乐观的。中美关系仍将在颠簸中前进。

陶文钊

2014年6月1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目 录

再版前言	001
序 章	001
第一章 民国初年	033
第一节 从共同行动到单干	033
第二节 不为中国问题卷入国际纠纷	044
第三节 “让日本在中国放手去干”	052
第二章 从凡尔赛到华盛顿	062
第一节 巴黎和会	062
第二节 华盛顿会议	072
第三章 动荡年代	086
第一节 美国与直系军阀	086
第二节 美国与广州革命政府	094
第三节 大革命时期	100
第四节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	113
第四章 从柳条湖到卢沟桥	123
第一节 不承认主义	123
第二节 棉麦借款与白银协定	135
第五章 从卢沟桥到珍珠港	146
第一节 战争第一年	146
第二节 国民政府苦撑求援	155
第三节 走向结盟抗日	170

	第四节 抗战前期中共与美国	187
第六章	战时盟国	202
	第一节 崎岖的合作之路	202
	第二节 特殊关系的建立	219
	第三节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	234
第七章	转折关头	245
	第一节 史迪威事件	245
	第二节 赫尔利与国共谈判	255
	第三节 扶蒋反共政策的形成	266
	第四节 雅尔塔会议。美国与中苏条约	276
第八章	走向对抗	289
	第一节 战后头半年	289
	第二节 马歇尔调处国共冲突。《中美商约》 的签订	302
	第三节 1948年《援华法》	325
	第四节 美国的两手政策与中共的“一边倒” 决策	340
附录一	英汉译名对照表	355
附录二	参考书目	360
附录三	大事记	378
附录四	图片目录	387

序 章

1784 年(乾隆四十九年)2 月 22 日,这是中美两国关系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第一艘远航中国的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满载着人参、毛皮、羽纱、棉花、铅等货品,从纽约港起航了。商船绕好望角,经印度洋,行程 20 900 公里,于 8 月 28 日驶抵广州。售完货后,它购进茶叶、丝绸、瓷器等,沿原航线返回,于 1785 年 5 月 10 日到达纽约。从此,为浩瀚的太平洋分隔在东西两半球的两个国家建立起了贸易关系。

为什么在美国于 1783 年 9 月刚刚赢得独立后,美国商人就远渡重洋,来华贸易呢?

早在美国独立前,北美地区和中国便有了贸易关系,中国的茶叶深受当地人民欢迎,中国的瓷器也已进入普通人家。但当时北美大陆的贸易为英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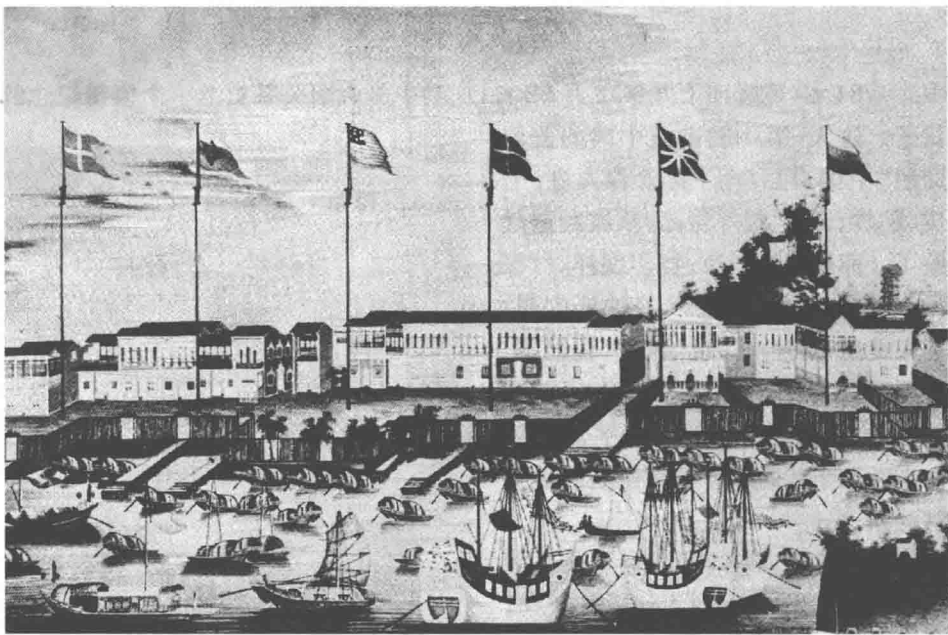
印度公司所垄断,北美十三州的商人不能直接进行对华贸易,经过长期的(1776—1783)艰苦的独立战争,北美十三州赢得了自由,但新生生的合众国面积仅仅 32 万



“中国皇后”号商务总管山茂召

平方公里,人口只有 200 万。这个松散的联邦面临着国库空虚、财政竭蹶的严重困难。英国仍然把美国当作敌国,对美国货物课以高额关税,不许其船只驶入加拿大与英属西印度群岛;法国、西班牙等也对美国实行贸易歧视;北美十三州的国内市场又十分狭小,所有这些情况迫使美国商人开辟新的海外市场。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东方,首先是中国。

“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共投资 12 万美元,利润达 3.7 万多美元,为本金的 25%。它的首航成功表明,一个新近独立的国家已为东方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作为平等的贸易伙伴所接受,这就为急于开拓对外贸易的美国商人展示了一个赢利的航向,理所当然地被美国各界视为一件大事。纽约各报竞相报道“中国皇后”号首航成功的消息,美国政府对此也十分重视。该船的商务总管山茂召写了一个关于此次驶华的详细报告,交给了外交部长约翰·杰依,报告被转交给国会,并受到褒扬。“中国皇后”号首航成功燃起了新英格兰商人开拓东方市场,追逐利润的强烈愿望,美国出现了对华贸易热。



1821 年前外国在广州的商行

但清政府以“天朝上国”自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以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把对外贸易看作是对外国的“体恤之恩”,^①对

^① 这是乾隆 1793 年致英王乔治三世信中的话,见梁廷柅:《粤海关志》,道光年间刻本,第 33 卷,第 7 页;第 26 卷,第 21 页。

于外商在华贸易和行动加以种种限制;对外贸易限在广州一口,由专营对欧美贸易的行商(即所谓“公行”,通称“十三行”)组织起来办理,行商担保外商缴纳税饷,负责约束外人在广州的居住和行动,等等。尽管如此,美国对华贸易仍有迅速发展,1792年后,美国对华贸易额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19世纪上半期,美国对华传统贸易仅次于对英、法、古巴的贸易,在美国对外贸易中居第四位。据清朝文献记载,从乾隆五十年(1785年)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54年间,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为4519艘。其中1/4(1150艘)为美国商船。^①在广州从事贸易的美国商号有9家,占外国商号总数1/6,其中最大商号早期是珀金斯公司,19世纪20年代后是旗昌洋行。这一时期中国输美的主要商品是茶叶、生丝和丝绸、土布,美国输华的货物有运自本国和北美大陆的土特产,如人参、皮毛和棉花,还有从欧洲贩运来的工业制品,如棉毛织品和金属制品。

中美贸易对两国是互利的,它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资金,也为中国提供了硬通货。美国商人从对华贸易中发了财,大多数美国商人对广州贸易能使他们有机会发一笔小财表示满意,他们便把商业资本的部分或全部转化为工业资本,投资于国内工矿铁路各业,或从事金融、房地产事业。珀金斯的助手及公司代理人约翰·顾新1803年到广州主持生意,1831年带着近100万美元回国。美商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在1800年到1809年与广州贸易中获利5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投资于曼哈顿的地产业。^②北美在殖民地时期,经济基础主要是农业,工业品多依赖进口。独立后,美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是农业国,没有什么工业品可供出口。因此在早期中美贸易中,中国一直享有顺差,美商主要用白银支付逆差,从而使中国得到相当多的硬通货。据统计,1805—1833年间美国输华货物总值为50294001美元,白银为89447817美元,为货物总值的1 $\frac{3}{4}$ 倍多。^③

为了牟取高额利润,减少贸易逆差,美商从19世纪初开始贩卖鸦片。鸦片毒害吸食者身心健康,清政府早在1729年就明令查禁,以后又一再重申不得进口。但清政府愈禁,走私鸦片的非法利润也就愈高。起先是葡萄牙、荷兰商人从事这一罪恶勾当,后来英商成为主要鸦片走私者。美商走私鸦片大约始自1805—1806年间。因为是走私,人们无从得知其确切数额。有的资料表明,1816—1833年间美商走私鸦片总额6495901美元,约为输华货物总值42705871美元的13%。^④美商的鸦片走私活动是早期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大污点。

从1875年起,中国也有极少数人去到那个遥远、陌生的国度。根据美国官

① 根据《粤海关志》第24卷第37—41页所列数字统计得出。

② Michael Hunt,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1.

③ 根据汪熙主编《中美关系史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116页表格统计得出。

④ 根据《中美关系史论丛》第115—116页表格统计得出。

方统计,从1820年到1841年华人赴美总数才13人。活跃的投资市场也吸引了中国商人的一些资金,他们或者与美商合做生意,或者赞助美国人在广州开医院,或者借钱给美商在美国发展事业。在中国缺少资本主义发展土壤的情况下,中国外贸商人的财富成为美国早期工业资本的一部分。

随着贸易关系的发展,中美两国间宗教和文化联系也产生了。1830年,美国海外传教会在美商赞助下派裨治文和雅裨理来中国,开美国传教士来华之先河。为了赢得中国人的好感,扩大教会的影响,他们在中国从事出版、译述、医务和教育等工作。由裨治文主编的英文月刊《中国丛报》(1832—1851,又译作《中国汇报》)广泛介绍中国的政治、经济、宗教、历史、风土人情等各方面情况,对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和促进中美贸易起了作用。1834年12月,在华的英美传教士及部分商人组成中国益智学会,编印通俗宗教宣传品,并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史地知识。裨治文编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1838年在新加坡出版)是一本用中文撰写的全面介绍美国历史地理的书籍,它成为中国朝野了解美国的主要依据。早年睁眼看世界的开明、先进的爱国者魏源在增订《海国图志》时,有关美国的材料几乎2/3取自该书,梁廷枏的《合省国说》也以此书为主要资料来源。

美国教士还在广州开设医院。1835年10月,传教士彼得·伯驾开设了“眼科医局”,受到广州各界的赞扬,六个星期之内就有450人到该医局就诊,行商伍敦元还给了不少资助。林则徐到广州后,也曾间接向伯驾求医问药。

美国教士还通过创办学校直接向青少年灌输基督教义。1839年勃朗夫妇在澳门开办了马礼逊学校,但在科举制度下,中国士大夫阶层把子弟送到外国人办的学校就读不啻是断送他们的前程,因此入学者寥寥无几。1841年只有6个学生,其中之一是容闳。1842年学校迁往香港,鸦片战争后,由于迫切需要通事(翻译)人材,入学人数才有所增加,1845年达30人。学校课程除汉语外,还有英语、算术、代数、几何、生理学、地理、历史、音乐等,这是在中国传播西学的第一所洋学堂,它给予学生的知识自然比中国封建的学塾丰富。勃朗夫妇于1847年返美,容闳等3名学生随他们前往美国,这是第一批中国留美学生。容闳等在勃朗及美国友人帮助下,就读于马萨诸塞州的芒松学校。容闳后来考上耶鲁大学,成为该校第一名中国学生。勃朗是第一个向中国学生系统传播西学,促成中国学生留美的外国人。

由于清政府禁止基督教流传,也由于基督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传教士虽然多方设法,但传教活动却收效甚微。到1839年领洗者不到100人,而且主要是给外商服役或经营外贸的下层人士。

在这一时期,中美两国间存在着贸易和文化交往,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美国虽然早在1786年就委派了驻广州领事,但根据清政府的规定,领事没有与所在国政府进行交涉的权力。清政府也不承认各国领事具有外交官身份,而只

把他们当作各国商人的首领,让他们与行商而不是官府打交道,因此美国领事从未起过外交官的作用。美国首任驻广州领事是山茂召,这一职位是为酬偿他在独立战争中的功劳的荣誉职衔。到1840年美国领事先后换过6个,都是商人兼任,均无薪金,国务院(1790年前为外交部)从未向他们下达训令,他们也很少向国务院汇报情况。

这一时期在美国与中国人之间发生的纠纷,一般都能得到公平处理。较之英国商人,美商也比较守法;而一旦他们触犯了中国刑律,便受中国法律制裁。1821年的“特拉诺瓦事件”就是一例。特拉诺瓦是美国商船“艾米里”号上的意大利籍水手。1821年9月25日他与卖水果的中国妇女郭梁氏发生口角,用船中瓦缸击伤郭梁氏头部,使其落水身亡。番禺知县传美国领事和该船船长共同验尸,并要求交出凶手受审。美国领事起先不肯,地方当局采取果断措施,命令停止所有美国船只的交易。美商震惊,被迫交出犯人。特拉诺瓦按清律处死。另一方面,清政府也保护美商的生命财产和合法权益。1819年,广州疍民(水上居民)李奉广勾结一伙人抢劫美国商船,打死5名美国人。广州当局立即将犯人捉拿归案,分别处斩。

总之,经济上互利、政治上平等是早期中美关系的主流,但是,美国商人的鸦片走私,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扩张欲望与清朝封建统治者闭关自守、力图与世隔绝的政策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间的深刻冲突,已经孕育着改变这种平等互利关系的因素。

自从英国在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用洋枪洋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中国便进入某些西方学者称之为“条约体系”的时期,即资本主义大国通过武力威胁、侵略战争或其他手段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使中国社会一步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时期。

《南京条约》的签订拆除了抵挡列强入侵中国的藩篱,美国政府紧接着采取了行动。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国情况的马萨诸塞州众议员顾盛于1842年12月27日写信给泰勒总统,建议遣使赴华,与中国订立与《南京条约》类似的条约。泰勒立即批准了这一建议,并委任顾盛为赴华特命全权大使。1843年5月8日,国务卿韦伯斯特根据从事对华贸易的美商的意见,训令顾盛来华获得英国人已经取得的全部利益,并指示他径直前往北京,向中国皇帝交上总统国书。

顾盛于1843年7月31日离华盛顿,翌年2月24日到澳门。清政府认为“各国纷纷请觐”、“与旧制有乖”,拒绝他进京。顾盛威胁广东巡抚说:“按西洋诸国成规,若不款外国使臣,即是欺藐其国,是与人以出师之名矣。”^①他还命令美

① 参见乔明顺:《中美关系第一页——1844年〈望厦条约〉签订的前前后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页。

国军舰“没兰地湾”号闯过虎门，开到黄埔，借口鸣礼炮，进行恫吓。清政府无奈，派出新任两广总督耆英为钦差大臣到澳门与顾盛谈判。对顾盛来说，进京或威胁进京是顺利订约的手段，而耆英却把维护清朝的“定制”、阻止顾盛进京作为他谈判的主要目的，因此对顾盛提出的条件几乎无不相从。经过半个多月的交涉，耆英和顾盛分别代表两国政府于1844年7月3日在望厦村订立条约34款。^①耆英认为《望厦条约》“大致尚与新定章程[指《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约略相仿”，“似与通商大局无碍”，^②实际上，美国根据利益均沾的原则，取得了中英条约中除割地、赔款的种种特权，此外还获得了更多的权益。顾盛自诩有16处超过了中英条约。这些新的权益主要是：

(1) 领事裁判权。《望厦条约》规定，无论美侨之间，美侨与中国人，还是美侨与其他外籍侨民的诉讼案件，均由美国领事审讯，中国官员不得过问，从此美国人在中国就不受中国法律约束了。这是对中国司法权的严重侵犯。

(2) 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条约规定，中国日后要修订关税税率（《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定税率为值百抽五），“须与合众国领事管官议允”，美国据此取得了参与确定中国关税的特权。

(3) 侵犯中国领海权。条约给予美国兵舰到各通商口岸“巡查贸易”的特权，中国官员非但不能管辖，还要“以平行之礼相待”，这样美国军舰便可以在中国领海自由游弋，在通商口岸任意出入。

(4) 文化方面的特权。条约准许美国人在通商口岸租地建房，开办医院，设立教堂，为美国在中国进行文化宗教渗透提供了便利，并成为列强进一步勒索的先导。

在顾盛谈判《望厦条约》时，传教士裨治文和伯驾不仅为之充当翻译，而且为之出谋划策。顾盛初到澳门时，他们就对顾盛说，在中国人“没有同外国人较量的愿望或打算时，威胁是有效的”，以此帮助顾盛确定其谈判战略。顾盛感谢裨治文和伯驾对他的帮助，赞赏他们“对中国有广博和准确的知识”、“功勋卓著，值得称赞”。^③正因为这样，美国政府在1846年到1857年间先后6次让伯驾负责公使馆工作。

《望厦条约》的订立使中美两国间的正式外交关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这不能不给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蒙上浓重的阴影。

中国开放五口通商以后，对外贸易有了较大发展。中美贸易从1845年的950万美元增加到1860年的2250万美元，其间美国对华输出增加了3倍。外

① 约文见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1—57页。

②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72卷，第1页。

③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p. 31.

国商品涌入中国,使中国小农业和家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开始受到冲击。中国土布原是欧美市场上的抢手货,1820年以前每年从广州大量出口。随着美国马萨诸塞州纺织中心的逐步建立以及英国纺织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土布出口逐渐减少。到了19世纪40年代,棉织品成为美国输华最主要的工业品,美国出口的棉布有1/3到了中国市场。这就使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省份本来很发达的棉纺织手工业受到沉重打击。手纺车和手织机竞争不过纺织机械,中国社会自然经济解体的漫长过程开始了。

《望厦条约》订立后,美国在通商口岸的传教活动也发展起来。1842年到1847年间,各国来华新教传教士共54人,其中美国传教士39人。截至1850年,美国在华传教士共88人。^①他们在通商口岸设立印刷厂,印刷宗教宣传品,创办学院、医院,为以后传教活动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随着五口开放通商,外国开始根据不平等条约在通商口岸划定供外侨“居住和经商”的一定区域,即租界。租界首先在对外贸易中心上海出现。1845年,英国率先在上海划定租界。1848年,以主教文惠廉为首的美国圣公会教士在苏州河北岸虹口建造教堂,美国侨民也纷纷在那里购置土地,建造房屋。文惠廉经与上海道台一再交涉,后者才允以该地作为美国人居留地,1863年6月才正式划定了界址。9月,上海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英美领事攫取租界的行政管理权、警卫权、司法权,两国并在租界驻扎武装部队,使之成为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的“国中之国”。上海公共租界的殖民地制度是旧中国租界中最完善、最典型的。

1856年10月,英法侵略者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美国政府认为这是坐收渔利的好机会。英法侵略军于1857年年底占领广州后,美使列卫廉同英法俄使一起从广州北上。英法联军于1858年5月攻下大沽炮台后,清政府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到天津议和,并分别于6月26、27日签订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美使北上的目的原是为了修改《望厦条约》,要求赔偿美侨生命财产损失。清政府实行“以夷制夷”的政策,企图联俄美以制英法。美国公使则利用清政府的幻想,诱使清政府在与英法订约之前(6月13日)订立了中美《天津条约》。事实使直隶总督谭廷襄认识到,“英法阳示其恶,美俄阴济其奸。强弱不同,其为贪得无餍,则均归一辙”。桂良等更报告说:美使“语言傲慢,借英夷为恐吓……不过欲享渔人之利”。^②

① 李定一:《中美外交史》,台北1960年版,第202页;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p. 26.

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2卷,第7页;第24卷,第33—34页。

中美关系史 1911—1949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侵略者坚持要在北京换约,并于1859年6月再次向大沽炮台发动突然进攻,受到守军坚决抵抗。当时在场的美国舰队司令官达底拿看到英法舰队受挫,不禁高呼:“血浓于水”,并称他不能“坐视白种人在他的眼前被屠杀”,指挥美舰向大沽炮台开炮,并援救受伤的英国士兵。^①英法政府恼羞成怒,增派远征军来华,攻陷大沽,进犯北京,焚烧圆明园,最后于1860年10月迫使清政府订立了《北京条约》。根据最惠国条款,清政府给予一国的权利,其他国家亦得均沾,因此清政府与英、法、俄、美签订的这一系列条约,除了个别特殊规定(赔款、边界)外,其他利权都是各国共同享受的。它们主要是:

(1) 允准各国公使驻北京,为各国对清政府施加影响并进而控制这个政府提供了方便。

(2) 规定新开沿海七口(牛庄、天津、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和长江四口(镇江、南京、九江、汉口),使通商港口增加到16个。

(3) 赋予英国人“帮办税务”的特权,使海关管理权落入外人手中;条约还规定子口税率为值百抽2.5。

(4) 使鸦片贸易合法化。

(5) 允许外国传教士在内地传教。

(6) 准许华工到外洋别地工作,“毫无禁阻”,从而使外国侵略者称为“猪仔”贸易的掠卖华工合法化。

美国由于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金矿,急需大批劳工。而当时美国东西海岸间交通不便,金矿投资商人要雇用东岸白人,需要用船把他们绕南美极端运到东岸,不如利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苦力来得便宜和快捷。华工从1854年开始潮涌而来,光这一年就有1.3万人。这些华工受到中间人的拐骗、利诱,甚至被强行捉拿,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签订自卖身契,约定一定年限,待旅费和人头税等代支全部抵消后,方能自由行动。旅途中他们拥挤在肮脏的船舱,伙食败缺,长途颠簸,有病不得治疗,死于旅途者为数不少。抵岸后,他们被分派至荒野矿场,终日辛劳,在恶劣的条件下担当最繁重、最危险、白人不愿承担的工作,受到矿主敲骨吸髓的剥削。

天津和北京的一系列条约签订后,列强要实现条约赋予的特权,便积极扶植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早在1860年6月,美国人华尔在清政府地方官署支持下招募在上海的外国冒险家和亡命之徒组成“洋枪队”,从太平军手中夺取松江,因而受到上海官僚买办集团的重视。1861年8月,华尔改组军队,招编中

^① 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ference to China, Japan and Korea in the 19th Centur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92), p. 340.

国人为士兵,而以欧美人为军官,用新式武器装备,进行新式训练。到11月这支军队发展到2000多人。1862年年初,太平军由浙江进军上海,华尔的军队帮助清军阻止了太平军的进攻。清政府授华尔四品顶戴花翎,并称他的军队是“常胜军”。8月,华尔在进攻慈溪太平军时毙命。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赶忙向清政府表示,应该选一个美国人来接替华尔的职务。在与英、法进行一番竞争后,原来华尔的助手、美国人白齐文担任了“常胜军”的管带。1863年,白齐文的职务为英国人顶替,这支军队也为英国人所控制了。翌年,太平军在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镇压下归于失败。

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列强积极扩张其在华势力,把通商口岸从沿海推向内地,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形态逐渐形成。对于清政府,它们实行所谓“合作政策”。美国公使蒲安臣是这一政策的积极倡导者。他认为,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是一致的,有约各国应当互相协调,“共同维护通商口岸的秩序”,并应帮助清政府巩固其统治,而不应在对华关系中动辄使用武力,同时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不平等条约规定的“义务”。蒲安臣因此得到清朝统治者的好感和信任,成为第一个对清政府具有重大影响的外国公使,恭亲王和总理衙门大臣对他简直言听计从。

1868年蒲安臣任满。当时清政府正担心各国乘修约之机(中英《天津条约》规定10年后对条约进行修订)肆意要挟,想遣使出洋,“笼络”各国,为修约作准备,但苦于没有适当人选。蒲安臣毛遂自荐,总理衙门于是聘请他为中国全权特使,并派两名中国官员随同出使,访问欧美各国,但未授权他订立条约。这是中国向欧美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团。

蒲安臣到美国后,竟擅自越权,于1868年7月28日与国务卿西华德订立了《中美续增条约》(即《蒲安臣条约》)8条。^①用西华德的话说,这个条约中“囊括了当前美国政府认为亟需用修改1858年条约的办法来加以调整的全部主要事项”。^②条约主要内容为:

(1) 条约重申了1858年《天津条约》保护传教士的规定。进一步为美国在通商口岸和内地传教扫清了道路。从1868年到1918年是美国在华传教事业大发展的时期,美国派到中国的传教士达2500人,占了它派往海外传教士8000人的1/3强。^③无论在传教、办学和开办慈善事业方面,美国都超过了其他西方国家。随着传教事业的迅速发展,中国民众的反洋教斗争也此伏彼起。条约的此项规定,正是为了使清政府更明确地承担镇压中国民众反洋教斗争的义务。

① 约文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261—263页。

② Frederick W. William, *Anson Burlingame and the First Chinese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2), p. 152.

③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8页。